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

【苏】С.И.鲁金科著
孙危译　马健校注

中 华 书 局

序

匈奴兴起于蒙古高原的大漠南北，有关其称谓，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晚期阶段，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史籍当中了。当时的秦、赵、燕三国都在北界修长城以防匈奴，故有“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①]的记载。

西汉初年，匈奴成为汉王朝最大的威胁，曾屡次南下寇边。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迎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被匈奴围困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密计”，以重金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脱。“白登之围”后，刘邦便采用娄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朝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武帝派马邑人聂壹，诱匈奴单于取马邑，又命李广、韩安国等率兵三十余万埋伏于城外，俟机出击，但被匈奴识破，引兵而去。此后，经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②]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至六年的漠南之战、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汉武帝大败匈奴，迫使匈奴退至漠北草原。[③]汉朝自武帝之后的宣、元之世，由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款塞和亲”，赢得了六十年无烽烟之警的和平局面，这从在内蒙古河套地区汉代朔方郡发掘出土的大量汉墓资料中可见一斑。[④] 东汉早期，匈奴虽曾一度中兴，但随着永元五年（93年）东汉王朝和南匈奴、鲜卑联军对北匈奴的沉重打击，匈奴主力退到了漠北与中亚一带，至东汉晚期，崛起于大兴安岭的鲜卑大联盟迫使北匈奴西迁后，匈奴就从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销声匿迹了。

---

①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3年。

②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3年。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

④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虽然自战国晚期到东汉晚期，匈奴在北中国活跃了近五百年，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均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在19世纪末之前，国内外对这个曾经引起过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古老民族的物质文化面貌却知之甚少，匈奴的研究仅仅局限在历史文献和语言学的层面上。同时，由于这些材料也多是语焉不详，从而导致在对匈奴诸多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关于匈奴的起源、习俗和信仰，匈奴与其他诸民族的关系，匈奴的物质文化特征，匈奴的南北分裂和西迁等问题，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自1896年俄国人类学者塔里克—格林采维奇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伊里莫瓦谷地的苏德日尼墓地发掘匈奴墓葬，并在1900年和1901年两次发掘了外贝加尔的色楞格地区吉达河左岸的德列斯图伊匈奴墓地，到索斯诺夫斯基1944年再次对伊里莫瓦谷地的匈奴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在这两处匈奴墓地发现的墓葬总数已近五百座。①

1912年夏，为了寻找金矿，俄国矿业勘探技术人员E.巴勒洛德在富含黄金矿藏的诺彦乌拉地区发掘了第一座匈奴墓葬。1924年，科兹洛夫和他的助手康德拉梯耶夫率领的蒙古—西藏考察团，对诺彦乌拉墓地进行了调查，并发掘了其中的一座被命名为“巴勒洛德”的木椁墓，就此拉开了诺彦乌拉匈奴墓葬发掘与研究的序幕。目前在诺彦乌拉发现的匈奴墓地共有三处，计有200余座，但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不足30座。2002年秋季，我在蒙古国做短暂考古调查时，曾考察过诺彦乌拉墓地。至今，墓地所在山谷依旧森林茂密，当年发掘后的墓葬底部原木搭建的木椁仍清晰可辨。

匈奴考古肇始于19世纪末期，诺彦乌拉墓葬的发掘与研究，至今也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回顾匈奴考古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这一阶段是对匈奴遗址和墓葬进行辨别和发掘的初级阶段，此阶段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城址、墓葬以及蒙古国境内的诺彦乌拉墓地。

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中期至80年代。这一阶段匈奴墓葬被大量发现并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国境内以及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这个阶段匈奴城址的发现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在蒙古国中部地区发现了十几座匈奴城址。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的七河流域和中国的黄河中上游地区。这两个地区相继发现

① 塔里克—格林采维奇，1898、1900、1902年；索斯诺夫斯基，1946年。

了公元1—2世纪的匈奴墓葬。

从匈奴研究的角度看，正是因为有大量考古材料的不断被发现，才使得有关匈奴的许多学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大量的匈奴考古资料中，诺彦乌拉墓地的发掘资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处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阶段的匈奴墓地，反映的正是匈奴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是这一阶段匈奴历史的一个缩影，墓内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为研究匈奴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汉匈关系以及中西交通等方面内容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但长期以来，诺彦乌拉墓地的发掘材料并没有得到科学、系统的整理。特别是发表的材料因出自不同人之手而比较零散，且多为俄文、日文和斯拉夫蒙文写成，中国的学者多数没有完整地看到这些材料，这实属一个遗憾。苏联著名学者鲁金科(С.И.Руденко)所著的《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是考古学界颇负盛名的学术专著，是匈奴考古资料最重要的报告之一，也是研究匈奴物质文化、汉匈文化交流必不可缺的一部著作，在匈奴考古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出版于1962年，书中较为完整系统地介绍了科兹洛夫率领的蒙古—西藏考察团所发掘的诺彦乌拉匈奴墓葬资料，还附有详细的出土器物图版，并作了相对客观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因此，将该书全部译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全书约有15万字，这部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孙危博士翻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马健博士校注，倾注两位年轻学者4年心血，查阅大量资料，在众多师友及其团队全力支持下完成的译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就要出版了，这实在是为众多研究者完成了一个夙愿。通读这部译著，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一提：

一、就百年来诺彦乌拉匈奴墓的考古来说，这是我们所见用中文表述的最为科学、完整和全面的考古资料，而且配发了全部插图和图版，这不但保证了原著资料的完整性，同时也给阅读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翻译者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原著的翻译，而是将全书分作上、下两编。上编是原著的翻译，下编则是针对原著的不足，在收集大量以往发表和翻译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的材料补充，计分为墓葬资料整理、译名对照表、参考文献和特列维尔著作图版四部分，对研究者理解原著并补充原著的不足有诸多益处。

三、由于原著作者并没有参加诺彦乌拉匈奴墓的发掘，在对原始材料

的理解和描述中，存在一定的错误和不足。译者在深入研究这批墓葬材料，并参照其他研究者发表材料的基础上，对原著中出现的明显错误都以“译者注”的形式，一一指出，并对描写不清楚的地方作了大量的补充。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学风值得提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著名民族史研究专家林幹先生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一书中，在展望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研究的未来时曾经提出：要重点翻译或介绍国外学者研究北方民族史的著作，以便参考其精华，批判其糟粕。孙危、马健等年轻学者翻译整理《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正是后辈民族学研究者践行前辈学者教诲的一次极好尝试。

希望开启了通往智慧之门的年轻学者们，利用他们外语和学术方面的优势，翻译和介绍更多好的学术著作给学术界，使我们的研究再上新台阶。

魏坚

2010 年 8 月 9 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译者说明

《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是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С. И. Руденко)编著的一部重要的研究性报告。诺彦乌拉墓群发现于1912年,当时俄国矿业勘探技术人员巴勒洛德(А.Я. Баллод)在蒙古乌兰巴托市以北100公里、恰克图(Кяхта)以南250公里处的诺彦乌拉山谷寻找金矿时,盗掘了楚鲁姆台(Цзурумтэ)谷口的一座坟冢。这座坟冢后来被称为"巴勒洛德墓葬"。

1913年3月,巴勒洛德给俄罗斯帝国地理协会东西伯利亚分会(ВСОРГО)写了一封名为《蒙古哈拉河流域不知名民族的古代坟冢》的信以期获得帮助,随后又将部分文物寄到了伊尔库茨克(Иркутск)。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帝国地理协会东西伯利亚分会苦于资金不足而被迫放弃了在这里发掘的计划。另一部分文物则被巴勒洛德私藏,包括琥珀、金饰片和一些人的头发。巴勒洛德死后数年,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从其妻子手中购得了这批文物。这批资料后来由赫都金以《诺颜山墓葬第一次发掘》为题发表。

时隔十年之后,科兹洛夫率领的蒙古—西藏考察团来到诺颜山进行了大量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1924—1925年,这支考察团在苏楚克台(Судзуктэ)、楚鲁姆台和古德日台(Гуджиртэ)三处墓地共发现了212座匈奴时期墓葬。他们首先重新清理了楚鲁姆台谷口的巴勒洛德墓葬,随后又发掘了8座带墓道的大墓和4座小墓。这8座大墓是:楚鲁姆台谷口的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墓葬、康德拉梯耶夫(Кондратьев)墓葬;苏楚克台谷口的M1、M6、M23、M25、M24、M12。其中M12、M24由捷普楼霍夫(С.А. Теплоухов)、巴洛夫卡(Г.И. Боровка)发掘,安德烈耶夫墓由安德烈耶夫发掘,其余墓葬则由康德拉梯耶夫发掘。尽管这些墓葬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盗掘,但仍出土了大批反映游牧文化特色的毛毯、木器、马具以及汉式丝织品、玉器、漆器等珍贵资料,从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批文

物随后被运往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参与整理工作的学者有德国的科摩尔（Otto Kümmel）、日本的梅原末治、美国的叶慈（W. P. Yetts），后来有部分文物归还了蒙古国。

1925 年，科兹洛夫考察团收获的这批资料的简报被刊布，分别是巴罗夫卡的《科兹洛夫蒙古—西藏考察团在蒙古北部地区的考察简报》与捷普楼霍夫的《诺颜山坟冢的发掘》。七年之后（1932 年），特列维尔（Camilla Trever）在列宁格勒用英文出版了《1924－1925 年蒙古北部的发掘》一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科兹洛夫考察团当年的发掘成果。这部书作为诺彦乌拉墓地最早的正式报告不仅刊布了大量遗物的图版，还在文末附录了器物登记表。1960 年，参加整理工作的梅原末治发表了《蒙古诺彦乌拉发现的遗物》一书，对遗物作了分类介绍并考证了其中一些的制作技法、使用方法及源流。1962 年，鲁金科与苏妮措娃娅（В. М. Сунцовая）、乌哈诺娃娅（А. В. Ухановая）、特洛斯基娜娅（Т. Е. Трошкиная）等人重新整理、发表了《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本书是截至目前关于科兹洛夫考察团在诺彦乌拉墓地发掘工作最详细的考古报告。书中不仅刊布了详细的器物登记表与大量遗迹、遗物的图版，还旁征博引，汇集了历史学、考古学、纺织学等许多领域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本报告后来还被译为德文，于 1969 年出版。

科兹洛夫考察团撤离之后，诺彦乌拉山谷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1927 年，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姆科夫（А.Д. Симуков）发掘了苏楚克台谷口的 5 号墓和另一座“西姆科夫墓”。

1954－1957 年，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率领的考察队重新对诺彦乌拉山谷的墓葬群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考察队采用了新的编号，他们发掘了苏楚克台谷口一座带墓道的中型墓葬——M46，以及 4 座圆形石堆墓：M14（道尔吉苏荣考察队编号 1 号墓）、道 2 号墓、道 3 号墓、道 4 号墓（苏楚克台 M9）。同时还发掘了苏楚克台 M1、M6 封堆旁的 8 个祭祀坑（Доржс Урэн Ц. 1961）。此外，他们还在苏楚克台山谷中部新发现了 3 处墓群共 17 座墓葬。1961 年道尔吉苏荣在《北匈奴》一篇长文中刊布了诺彦乌拉墓地的新资料，同时也对以往的研究作出了补充、修订。

2006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博罗斯马克（Natalya Polos'mak）指导下，俄蒙联合考古队在诺颜山发掘了一座带墓道的中型墓葬——苏楚克台 M20。墓葬出土了金饰牌、汉式马车、带有异

域风格图案的毛毯等精美文物。目前已有部分资料发表。

尽管在科兹洛夫考察团之后，在蒙古国境内、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萨彦－阿尔泰地区以及中国北部已科学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匈奴墓葬，其中在呼尼河畔的高勒毛德一号、二号墓地，外贝加尔地区的伊里莫瓦墓地，查拉姆墓地，鄂嫩河中游的德尔利格墓地、包尔布拉格墓地，已发现了许多“甲”字形的大型墓葬，但诺彦乌拉墓地作为蒙古高原中北部一处内涵丰富的大型墓地，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由于鲁金科并未参加过诺彦乌拉墓地的发掘工作，他主持整理、编写的这部《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是在科兹洛夫考察团考古工作的三十七年之后，书中的纰漏在所难免。但书中援引、汇集了大量相关考古学资料、历史文献和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匈奴考古学研究领域中不可不读的一部重要专著。

匈奴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在美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多个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这一领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诺彦乌拉墓地的考古学资料以往仅散见于一些研究论文与著作，如马长寿先生的《北狄与匈奴》、陈序经先生的《匈奴史稿》、林幹先生的《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等，还没有全面介绍这批资料的译著。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翻译了鲁金科的这部《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希冀能够为我国边疆考古、民族史研究者以及爱好者提供一些帮助。

翻译体例说明：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俄文原稿的中文翻译。我们对原稿解释、说明、补充的内容均以译者注的形式附于页下。

下编分诺彦乌拉墓葬资料整理、译名对照表、与匈奴有关的参考文献三部分。在诺彦乌拉墓葬资料整理部分，我们按照我国考古学报告描述范例，对诺彦乌拉墓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由于特列维尔所编著的报告中的器物登记表更为详尽，因此我们在出土物介绍部分以特列维尔的器物编号为准，同时将能够对应的鲁金科所编的序号附在每件器物之后。另外，特列维尔与道尔吉苏荣刊布的12号墓的资料与鲁金科M24资料相同，而鲁金科在书中并未提及12号墓的资料。据道尔吉苏荣调查，M24出土物很少，“除了一些丝织物、衣物残片外，只有3个石球、3个琥珀球、4片锤揲出图案的金箔以及一些装饰着兽头的青铜器皿残片”。这两座墓葬是

由捷普楼霍夫、巴洛夫卡发掘，资料也是由他们发表的，资料介绍不甚清晰、完整。鉴于此，我们将鲁金科描述的 M24 出土器物归入 12 号墓。

在下编第二部分的译名对照表中，我们参照了百科类全书以及相关论著习用的译名对照方法。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列举了国内外学者在匈奴考古学领域的相关论著，供深入研究的学者们参考。另外，我们还将特列维尔刊布的与诺彦乌拉墓葬相关的插图和图版资料进行了整理并附录于此。

译者

目　录

序 …… 魏　坚　Ⅰ
译者说明 …… Ⅴ

上　编

前　言 …… 3
第一章　匈奴的墓葬 …… 7
第二章　匈奴的经济 …… 25
第三章　住所与家具 …… 34
第四章　服装与饰物 …… 44
第五章　交通工具 …… 56
第六章　各类器物的制作工艺 …… 60
第七章　武器与军事 …… 73
第八章　匈奴的社会组织 …… 78
第九章　形象艺术 …… 85
第十章　宗教信仰与祭祀 …… 103
第十一章　匈奴的对外联系与交流 …… 110
结　语 …… 130
附录一:艾尔米塔什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诺彦乌拉巨冢出土物品清单 …… 138
附录二:参考文献 …… 164

下　编

一、诺彦乌拉墓葬资料整理 …… 245
二、译名对照表 …… 285
三、与匈奴有关的参考文献 …… 288
四、特列维尔著作中相关插图、图版和彩版 …… 312

后　记 …… 341
补　记 …… 343

插图目录

图 1/P.8:诺彦乌拉墓葬分布示意图

图 2/P.9:墓地平面图(包括古德日台、楚鲁姆台和苏楚克台)

图 3/P.9:苏楚克台墓地平面图

图 4/P.10:诺彦乌拉 M24 剖面图

图 5/P.11:诺彦乌拉 M24 棺椁平面图

图 6/P.11:诺彦乌拉 M24 棺椁剖面图

图 7/P.12:诺彦乌拉 M24 出土的棺

图 8/P.12:诺彦乌拉 M24 出土的棺:

1.棺底板;

2.棺侧板

图 9/P.13:巴勒洛德墓葬剖面图

图 10/P.14:巴勒洛德墓葬棺椁平面图

图 11/P.14:巴勒洛德墓葬棺椁剖面图

图 12/P.16:诺彦乌拉 M1 棺椁平面图

图 13/P.16:诺彦乌拉 M1 棺椁剖面图:

1.南北向;

2.东西向;

3.棺椁支架残余

图 14/P.17:诺彦乌拉 M6:

1.外椁平面图:f、盗洞;e、方形原木

2.外椁南侧壁:κ、盗洞;e、方形原木

3.内椁南侧壁:g、盗洞;h、考察团掏的洞

图 15/P.18:诺彦乌拉 M6 棺椁平面图

图 16/P.18:诺彦乌拉 M6 棺椁剖面图:

1.东西向；

2.南北向

图 17/P.19：诺彦乌拉 M6 棺结构图：

1.棺盖板；

2.棺侧板；

3.棺侧板剖面

图 18/P.20：诺彦乌拉 M23 棺椁平面图

图 19/P.20：诺彦乌拉 M23 棺结构图：

1.棺盖板；

2.棺底板；

3.棺盖板剖面

图 20/P.21：诺彦乌拉 M23 棺结构图：

1.南北向的棺侧板；

2.南北向棺侧板的剖面；

3.东西向的棺侧板；

4.东西向棺侧板的剖面

图 21/P.23：诺彦乌拉巨冢中出土的各种支脚：

1.诺彦乌拉 M24 出土的支撑椁盖板的支脚；

2.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支撑椁的木柱支脚上端；

3.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支撑椁的木柱支脚下端

图 22/P.28：伊沃尔加城址出土的骨镞和角镞：

1、2、3、8.柳叶状的镞；

6、7.矛头状的镞；

4、5、11.三角形的镞；

9.叶柄状的镞；

10.桂树叶状的镞

图 23/P.32：伊沃尔加城址出土的生铁犁铧

图 24/P.36：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木质桌面

图 25/P.37：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带流木器

图 26/P.38：诺彦乌拉巨冢中出土的各种随葬品：

1.青铜残件；

2.诺彦乌拉 M25 出土的青铜把手；

3.诺彦乌拉 M25 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嘴；

4.诺彦乌拉 M1 出土的青铜器物；

5.诺彦乌拉 M1 出土的青铜器皿；

6.诺彦乌拉 M25 出土的木勺；

7.诺彦乌拉 M25 出土的青铜盖子；

8.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木器底部；

9.诺彦乌拉 M24 出土的带孔木板；

10.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马鬃；

11.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带孔木板

图 27/P.39：诺彦乌拉巨冢中出土的各种随葬品：

1.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青铜器嘴；

2.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青铜器嘴；

3.安德烈耶夫墓葬出土的青铜勺；

4—6.诺彦乌拉 M25 出土的青铜杆套；

7.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木支脚；

8.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木塞子；

9.诺彦乌拉 M29 出土的铁马衔；

10.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盾牌状的木板；

11.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木棍；

12.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木铲；

13.诺彦乌拉 M23 出土的带有六个穿孔的圆木板；

14.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带有雕刻花纹的木铲；

15.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髹有红漆的心形木片；

16.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没有髹漆的心形木片；

17.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木铲

图 28/P.40：伊沃尔加城址中出土的石耳杯

图 29/P.40：匈奴的青铜鍑：

1.鄂尔多斯式；

2.诺彦乌拉 M6 出土；

3.奇洛那河流域出土（位于蒙古境内）

图 30/P.42：1.伊沃尔加城址中出土的骨质刀柄；
2、3.苏德日尼墓地出土的铁刀

图 31/P.44：中国境内的游牧民族：
1.14 世纪；
2.17 世纪

图 32/P.45：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男式毛质灯笼裤

图 33/P.46：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男式丝绸灯笼裤

图 34/P.47：1.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缝制在裤子上部边缘的图案（图版十二，1）；
2.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缝有丝绸镶边的毡质靴子；
3.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表面还残留着皮革的毡质靴子

图 35/P.47：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外面包有丝绸的毛质的鞋垫：
1.正面；
2.背面

图 36/P.48：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丝绸长袍（正面）

图 37/P.49：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丝绸长袍（背面）

图 38/P.49：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外面包有丝绸的毡质袍子

图 39/P.50：诺彦乌拉 M 出土的、外面包有貂皮的丝织衣物：
1.正面；
2.背面

图 40/P.52：诺彦乌拉巨冢中出土的带扣和饰物：
1.青铜镀金带扣；
2—4.青铜镀金饰牌；
5、7.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银带扣；
6.诺彦乌拉 M25 出土的带有花纹的银饰牌

图 41/P.53：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墓葬中出土的饰物：
1.青铜马饰牌；
2.青铜牛头饰牌；
3.青铜虎头饰牌；
4、5、6.仿贝壳的青铜饰物；

7.青铜环；

8、9、10.青铜铃铛；

11.透雕青铜环；

12.骨环；

13.玉环

（其中 1、2 出自杜列那遗址；3、4—12 出自德列斯图伊墓地；13 出自伊沃尔加城址）

图 42/P.55：诺彦乌拉巨冢中出土的伞盖：

1.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伞盖木柄上部；

2.安德烈耶夫墓葬出土的伞盖上的青铜帽

图 43/P.56：诺彦乌拉巨冢中出土的马镳：

1.德列斯图伊墓地出土的角质马镳；

2.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铁质马镳

图 44/P.59：巴勒洛德墓葬出土的木质车轮（部分）

图 45/P.59：诺彦乌拉 M24 出土的木质车轮（部分）

图 46/P.61：取火工具：

1.角质（伊里莫瓦谷地出土）；

2.角质（苏德日尼墓地出土）；

3.用牛距骨制成的（伊里莫瓦谷地出土）

图 47/P.62：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木质支架

图 48/P.66：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毯子

图 49/P.66：诺彦乌拉 M6 出土毯子的细部（背面）

图 50/P.67：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覆盖在鞍桥上的丝绒：

1.正面；

2.背面

图 51/P.69：外贝加尔地区出土的陶器：

1、3—7、9、10.伊沃尔加城址出土；

2、8.苏德日尼墓地出土

图 52/P.70：伊沃尔加城址出土陶器底部的印记

图 53/P.74：蒙古土拉河流域出土的青铜物件

图 54/P.87：鄂尔多斯青铜艺术品：

1.牛头；

2.身体翻转的绵羊；

3.马；

4.野猪；

5.虎头；

6.山羊；

7.鹿；

8.狼；

9.动物搏斗的场面

图 55/P.89：鄂尔多斯青铜艺术品：

1.虎头和两个格里芬；

2.牛头带扣；

3.虎头；

4.带有几何形装饰图案的透雕饰牌；

5.双马饰牌

图 56/P.89：伊沃尔加城址出土的青铜透雕饰牌

图 57/P.91：鄂尔多斯青铜艺术品：

1.绵羊；

2.鹿；

3.虎羊搏斗；

4.一对格里芬的头；

5.水滴状饰物；

6.虎与格里芬搏斗

图 58/P.93：德列斯图伊墓地出土的雕刻着格里芬攻击绵羊场景的金饰牌

图 59/P.97：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中国丝织物上的图案：

1.飞马和猎手；

2.飞羊

图 60/P.98：诺彦乌拉 M24 出土的中国丝织物上的镶边图案：鸟形的格里芬

图 61/P.101：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帷幔镶边图案：虎头

图 62/P.102：汉代中国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